



## 【论 文】

# 转型与反思中的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

——对中国当代民族研究的一点体会和评论

常 宝<sup>1</sup>

## 一、中国社会转型及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

中国社会从 20 世纪 70-80 年代进入了改革与转型时期,尤其进入 21 世纪后社会改革与转型上升到新的发展阶段,不仅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迁,作为社会发展与变迁的推动力和催化剂的诸多公共政策也发生了新的调整和内容、范式的演变。据学者研究,“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公共政策活动经历了三种范式的演变,从批判理性动员型范式,经过经济理性引导型范式,过渡到社会理性服务型范式。”<sup>2</sup>

社会转型与政策、理论的反思之间具有相辅相成、不断促使和联动的关系。“从本质上讲,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全社会政策学习的过程。这种广义的政策学习,无论是刻意的、自觉的,还是无意的、自发的,都包含着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内容。”<sup>3</sup>有人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业已经历政治的三十年和经济的三十年,未来的三十年将是社会的三十年。建国后,中国先后通过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政策工具来推动和促进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社会政策、理论模式和公共管理范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可对建国以来的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回溯和总结,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的发展、调整与变化轨迹,既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加以理解和解释,也对民族政策范式和理论的内容与形式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

### (一) 早期的“自决型”民族政策

历史以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中国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从其成立那天开始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早期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更多借鉴了前苏联的民族理论,主张各民族“民族自决”的观点。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自决”、“自治”、“民主自治邦”和“建立联邦共和国”的主张。1928 年,党的六大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口号中明确提出:“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早期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照搬前苏联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和民族的实际,对过去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改变,在抗日的特殊社会使命和现实条件下提出了“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民族团结”政策,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前苏联的实践基础上初步创建了中国民族理论体系,为之后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各民族平等的联合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和理念。

### (二) 国家与民族关系的弥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

在一个国家,政府和统治者首先要回答和阐明的事实就是国家主权与国内各民族、族群群体

<sup>1</sup> 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sup>2</sup> 严强,“社会转型历程与政策范式演变”,《南京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sup>3</sup> 严强,“社会转型历程与政策范式演变”,《南京社会科学》,2007 年第 5 期。

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本质问题。马克思主义承认民族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在自主的基础上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认为一个民族既可以同其他民族共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可以建立联邦制国家，还可以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进入 20 世纪 30-40 年代，随着中国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和分析进一步深化，选择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建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形式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地方治理框架。1938 年 9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总方针，正式提出“民族平等”、“共同联合建立统一国家，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允许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抗日战争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国家民族政策转向尊重各民族的平等权利、联合建立统一国家模式，初步提出了建立自治区和实行区域自治的主张。从此，国家政策与民族问题解决纲领从民族自决、联邦制的提法逐渐转向创建“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思想，成为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

在 1949 年 9 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阐述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认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0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并成为新中国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首先是对旧社会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与民族同化政策的否定。”<sup>1</sup>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族工作主要致力于消除民族隔阂、坚持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基本建立了新型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边防、维护社会安定成为国家民族政策的核心任务。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制化进一步固化了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1984 年 5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始进入需要更加完善和调整的反思性发展阶段，国家开始用法律的形式规范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型”民族政策

发展是解决社会和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民族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多方面、综合性的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全社会开始思考民主、自由、个人利益、个性的解放、资本和法治等问题。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拨乱反正实践的深入，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发展的政策得以全面恢复和落实。与此同时，在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实践中，民族问题有了新的变化。例如，在当时的内蒙古等地出现了民族关系复杂化的趋势。1982 年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把民族问题提高到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指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民族政策主要以“发展”为实施路径和任务，主张通过“发展”继续巩固和维持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国家民族工作必须抓住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主题，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继承、发展、创新是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实践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凝结成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中国特色。”<sup>2</sup>

在当代中国民族政策与理论的建构过程中，西藏和新疆地区始终成为实践的前沿和范本，对当代民族政策的调整和制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90 年，江泽民在新疆视察工作时，从 5 个方

<sup>1</sup> 青觉，“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主题”，《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 年，第 2 期。

<sup>2</sup> 青觉，“发展：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网，2011 年 6 月 22 日。

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从8个方面概括了我们党观察、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

在民族地区发展中，中央政府依然注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道，并列为我国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重新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还于2005年5月颁布了《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2005年5月27日，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巩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是党和人民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强调：“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 **（四）21世纪“共同繁荣型”民族政策**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国内改革开放的负面效应的影响下，经济高度繁荣所带来的不平衡、群体冲突的种种社会问题在国家与地方、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中显现出来，针对社会矛盾复杂化、社会不和谐局面，国家与政府提出了实施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和政策理念。在民族地区，民族主义和分裂倾向有了新的发展动向，国家与地方、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中国民族政策关注的焦点，2005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和谐”被确定为民族关系的核心特性。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乌鲁木齐“7·9”事件的发生大大促成新的地方治理战略和民族政策的出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社会问题和民族关系，将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工作提升到社会建设的核心位置。2009年9月29日，胡锦涛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促进我国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奋力开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不断形成实现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力量，不断形成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强大力量，不断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强大力量。”在2010年1月中旬举行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也提出了衡量民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就是：“有利于民族平等团结进步、有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有利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 **二、反思性理论：关于民族的多元讨论**

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中国民族理论在不同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不断改进和探索，从分析视角、理论借鉴、概念的解读和话语争论方面发生演变和更迭，具有了多元、广泛的讨论与反思性特点。

### **（一）分析视角与理论借鉴**

#### **1. “民族工作”：国家政治视角**

作为国家与政府的民族问题解决方针、策略和途径，中国“民族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的工作之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保持少数民族地区的稳

定,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尽早走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努力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问题,关系到我国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必须高度重视。”<sup>1</sup>这就是国家民族工作所关心的主题和行为目标。显然,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针政策与具体措施,是一种政治理念与行为。

## 2. 学科视角与知识背景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民族”与民族问题不仅成为国家与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工作的对象和内容,也逐渐成为学科研究和学术思考的主题,其中“民族学”和“民族社会学”是两种核心视角。

### (1) “民族学”

“民族学”,(Ethnology,源自希腊语:ἔθνος,意指“民族,国族,种族”)是人类学的分支。“本学科比较与分析人类的族群、种族与(或)国家群体之间的起源、分布、技术、宗教、语言与社会结构。”<sup>2</sup>

19世纪中叶,民族学在欧美形成和发展起来,20世纪初传入中国。早在1926年蔡元培发表了“谈民族学”一文,介绍了民族学的内容和意义。“民族学”在中国的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前苏联的民族学与西方民族学进化派理论的传播有密切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学工作者参加了政府组织的各种访问团或工作队,到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各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阶级状况以及民族关系,作为进行民主改革以及制订民族政策的科学依据。

民族语言、历史与文化研究是“民族学”的出发点,也是其独有的视角。正因为如此,目前,随着美国文化人类学与英国社会人类学逐渐成为优势学科,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越发成为边界模糊的三种学科领域。

### (2) “民族社会学”

“民族社会学”(ethno sociology),研究不同民族社会形态结构、功能、分层及其发展趋势的一门学科。“民族社会学”以民族的社会文化结构形态为中心,研究不同民族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既不像“民族学”那样以民族本身为研究对象,也不像社会学那样以整个社会为研究对象。“民族社会学”使用社会分层、角色、教育和收入等社会变量对社会问题和民族、族群个体与群体的处境和状况进行微观与宏观分析。在国外,如美国、加拿大,“民族社会学”主要以种族和族群为研究对象。

中国“民族社会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0年蔡元培在“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演讲中说:“社会学与民族学是有密切关系的两门学科,这两门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不少方面是相互联系的”。1982年费孝通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提出了“民族社会学”概念,并倡导“把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研究作民族社会学。”<sup>3</sup>进入20世纪90年代,学科理论研究逐步深化,出现了一批本土经验与国外理论相结合的中国民族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 (二)“民族”的两种属性

在中国,中华民族是“民族”,少数民族也是“民族”,人们关于“民族”的讨论中必须面对和回答“民族”所涵盖的多种意义和层次问题,即首先要解释国家层面,也就是“民族-国家”的“民族”(国族)和“族类”的“民族”(族群)之间的关系和认同问题。

### 1. “民族”的国家论

#### (1) “国族”的确立

“民族”与“国家”政体之间的关系历来存在着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和互动。在“民族-国家”

<sup>1</sup> 江泽民,“在听取全国民委主任会议汇报时的讲话”(1990年2月15日),原载1990年2月16日《人民日报》。

<sup>2</sup> Newman, Garfield, et al (2001). Echoes from the past: world history to the 16th century. Toronto: McGraw-Hill Ryerson Ltd. ISBN 0-07-088739-X.

<sup>3</sup>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的条件下，“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及利害多是相互一致的，民族的愿望可以直接成为国家政策的基础。国家的政治社会化与一体化努力，久而久之，便可以改变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国家政治制度。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家的宪法也可能对国内各民族的利益做出保障。”<sup>1</sup>

“国族”的概念，是为了区别于现有的“国家”与“民族”的概念。“在西方，国族主义的大行其道是18世纪末以后的产物；在中国，受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刺激而兴起的国族主义，则流布于19世纪末以后，并且持续到今日。”<sup>2</sup>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sup>3</sup>显然，在中国的“国族”问题上早期的孙中山提出了以“汉族”为“国族”的观点，后来逐渐修正和改变了“国族”观点，形成了“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入，此为民族之统一”的“五族共和”观念，并与“中华民族”思潮合流了。

## (2) “中华民族”共同体

在中国这样多民族国家中，人们始终关注和研究如何处理国家与国家层面的民族关系？如何将一般民族认同转化为国家认同和国家民族认同？等问题。其中，最有效的办法是建构一个国家层面的“国家民族”或“国族”，与国家相对应，进而建立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没有资格和地位成为“国族”，因此，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界始终努力建构一个象征性的“国族”，从而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国族”——“中华民族”逐渐诞生。

“中华民族”一词是在清末立宪和民族观之争中由梁启超于1903年提出的。“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宪政塑造始于民国时期。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中国民族的研究，最早的是1928年“爱文书局”出版的常乃惠的《中华民族小史》。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建构“中华民族”的理论探讨一直未断。在近代以来的“国族”概念及其认同的基础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充分总结和讨论了几千年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及其本质问题。就如费孝通所论述的那样：“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sup>4</sup>1995年，宁骚指出：“在中国，只有一个民族才能称作民族(nation)，这就是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现在，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在‘全体国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这一含义上使用民族(nation)一词。”<sup>5</sup>并始终强调了“国权”和“族权”对立统一过程。马大正认为：“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概念，也是一个国家概念。”<sup>6</sup>马戎从民族主义角度指出：“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色彩的，所以凡是中华民族为主体的运动，称为‘民族主义运动’。”<sup>7</sup>

虽然“中华民族”概念的生成与演变几经波折，但其目的是为了建构国家层面的民族，从而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以建立“民族-国家”。民国以来中国学界和政界力图建立的“国族”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单一民族，而是多民族联合、融合的一个总体性民族概念和实体。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制订的发展方略、政治实践和学者的学术话语中“中华民族”已经成为表述

<sup>1</sup> 徐杰舜，“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sup>2</sup> 卢建荣著，《分裂的国族认同1975-1997》，麦川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32页。

<sup>3</sup> 孙中山著，《孙中山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74页。

<sup>4</sup> 费孝通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2页。

<sup>5</sup> 宁骚著，《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14页。

<sup>6</sup> 马大正，“论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光明日报》2003年7月29日。

<sup>7</sup> 马戎著，《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

中国各民族的通行名词，“中华民族”作为国家的文化属性，直接服务于中国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增强。

## 2. “民族”的族群论

由于中国政治与学术领域中的“民族”概念所涵盖的意义和所指十分复杂而多变，有学者试图选择使用另一种概念进一步解释、界定，甚至取代“民族”的功能和多元意义。

20世纪60年代“族群”（ethnic groups）概念在西方流行，90年代“族群”概念通过台湾、香港引入中国大陆。

何谓“族群”？其定义及理解问题，学界有了不同建议和阐述。“族群”的引用，使人们对原有“民族”概念进行重新思考，有学者提出“族群概念代替56个民族的概念”的建议，如：兰林友建议：“以族群概念替代56个民族的概念，在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的意义上，既可用民族（nationality）概念，也可用族群（ethnic groups）概念。”<sup>1</sup>对此，有些学者持反对态度，如：何叔涛认为“近10年来，由于一些颇有影响的学者引进了西方的‘ethnic groups’这一术语，并翻译成‘族群’，力图用‘族群’概念逐渐取代传统的‘民族’概念。这样一来，就使得原来就比较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更加混乱了。”<sup>2</sup>

“族群”与“民族”有何关系？如何界定“民族”与“族群”等问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徐杰舜认为：“族群强调的是文化性，而民族强调的是政治性。族群这个人们共同体的根本属性在于它的文化性，无论哪一位学者的定义都认同这一点。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虽然也具有文化性，但这不是它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一些民族虽然没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但仍然认同为一个民族，因为他们仍具有民族的自我意识。”<sup>3</sup>

### （三）当代民族研究的几种话语争论

#### 1. “前苏联的解体”的教训是否值得借鉴？

1991年，20世纪最大社会主义阵营前苏联解体，给以苏联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为典范的中国民族研究带来了“震撼”，从此进入总结前苏联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反思性阶段，许多学者开始思考中国是否要面临同样的结局？应吸取什么样的教训？等问题。对此，马戎指出：“中国在21世纪可能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就是国家分裂。……在我们的身旁，苏联这艘巨轮已经解体，民族自决理论就是导致其解体的腐蚀剂。这一腐蚀剂注入并流淌在甲板的各个结合部，在人们不知不觉间降低了船体的整体稳固性，使大船无法经受起巨大的风浪和暗礁的撞击。在21世纪，解体的苏联应当一直是中国的‘前船之鉴’。”<sup>4</sup>马戎进一步指出：“苏联在1991年突然解体是一件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大家容易忽视的另外一个事实是：直至事件发生的前夕，无论是苏联学者、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没有人对此做出任何预测警告。”<sup>5</sup>与此相反，毛公宁认为：“苏联是在原来多个民族国家的基础上于1922年建立起来的，当时是为了跟德国法西斯相抗争。而中国从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统一占主导地位，有时候发生一些割据、纷争、或者分裂的局面，但是通过短暂的分裂之后在原来的基础上实现更高的统一，而且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以民族建立国家的历史。”“苏联的情况跟中国不一样，中国‘不会出现像苏联那样的局面’。”<sup>6</sup>

#### 2. “去政治化”是否“伪命题”？

在“民族”与“族群”的政治与文化属性讨论中“政治化”与“文化化”概念油然而生，马

<sup>1</sup> 兰林友，“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sup>2</sup> 何叔涛，“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sup>3</sup> 徐杰舜，“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sup>4</sup> 马戎，“中国可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环球时报》2011年9月20日。

<sup>5</sup> 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国家分裂的风险？”，《领导者》杂志（香港）2011年2月、4月刊。

<sup>6</sup> 中国新闻网，<http://news.qq.com/a/20090813/002162.htm>，2009年08月13日。

戎提出的“去政治化”已成为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马戎认为：“多民族国家的政府在设计本国民族关系的政策方面，大致有两类导向，一类我称之为‘政治化导向’……另一类我称之为‘文化化导向’，即把各群体之间的各种差异（语言、宗教等）主要视为‘文化差异’，把群体边界‘模糊化’，努力淡化各群体的‘民族意识’，同时积极强化‘公民—国民意识’。……中国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的传统思路属于‘文化化’（“有教无类”）这一类，以文化差异来看待‘夷夏之辨’。”<sup>1</sup> 对此观点，有很多反对声音，争论十分激烈。如：郝时远认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是‘苏联模式’，用‘苏联模式’括套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政策和实践而提出‘去政治化’主张，是一个违背事实的伪命题。”<sup>2</sup> 还有陈玉屏、王希恩等学者同样持批评态度。

### 3. “第二代民族政策”概念是否成立？

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经历了不断调整 and 发展的历史时期，有学者对民族政策演变与发展过程进行了“第一代”与“第二代”的时间区分。

“前苏联的民族大拼盘模式被称为第一代民族政策，又称为民族区域自治。它源自列宁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是摆脱资产阶级的民族纷争，防止工人被民族文化分化，防止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教唆互相残杀的根本制度。”<sup>3</sup>

一部分学者对“第一代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后果提出了反思和批评，指出了几十年来中国民族政策模式的弊端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概念。胡鞍钢、胡联合认为：“前苏联的模式在中央财力下降使得中央无力实行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地区和民族均衡发展，导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导致地区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不断激化，最终国家陷入分裂。”“我们需要顺应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发展潮流，善于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也充分吸取失败教训，与时俱进地推动民族政策实现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促进国内各民族交融一体，不断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识，不断淡化56个民族的观念，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切实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sup>4</sup> 梅新宇认为：“近30年来举世公认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解决民族问题，我们必须正视现行民族政策和理论的缺陷。在现行民族政策中，最引人争议的莫过于过多过滥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因为这既违背人人平等的理念，又不符合客观的政治经济现实，还造成了一些越来越明显的负面作用。”<sup>5</sup>

### 4. “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不容改变”吗？

在中国民族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始终处于中心位置。针对“去政治化”与“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张，一部分学者进行了强烈的反驳。郝时远指出：“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时提倡移植美国的‘熔炉模式’、民族政策的‘去政治化’乃至‘改制建省’等主张的背后，不正是这种一国之内主体人群的族裔民族主义思想在作怪吗？只有各民族真正的平等，才能实现广泛的交流、才能保持和睦的交往、才能成就自觉的交融，这是通则和公理”、“既然不能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东部率先发展’是‘第一代改革开放政策’，也就不存在‘共同富裕’和‘西部大开发’是‘第二代改革开放政策’的说法，中国的民族政策体系也是如此。”<sup>6</sup> 张海洋也认为：“第二代民族政策不肯正视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民族认同意识，

<sup>1</sup> 关凯，“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中）”，《中国民族报》2007年3月9日。

<sup>2</sup> 郝时远，“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不容改变（二）——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一（下）”，《中国民族报》2012年2月10日。

<sup>3</sup> 中国民族宗教网，第一代民族政策，<http://www.mzb.com.cn/html/folder/292729-1.htm>。

<sup>4</sup> 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sup>5</sup> 梅新宇，“为何和谐的民族关系现在出现不和谐？”，《人民网》2012年2月28日。

<sup>6</sup> 郝时远，“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不容改变（二）——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一（下）”，《中国民族报》2012年2月10日。



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国民当成敌对势力，是撕毁和废除国家宪法条文。”<sup>1</sup> 对此，潘志平认为：“时代不同了，虽然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仍然希望继续坚持这样的政策，并认为这一政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但我觉得还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sup>2</sup> 吴楚克提出：“我们民族政策的目标就是把西北和西南当作沿海和东部来对待。只有真正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真谛，才能从根本上反思中国的民族政策和理论。”<sup>3</sup>

### 三、当代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的形成条件及原因分析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面对复杂而不断变化着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其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依据民族关系发展大局，经历了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回眸新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的演变、发展历程，近代以来变化多端的世界政治格局、民族-国家角色和区域社会文化功能变迁等因素成为其形成与发展的外在条件和原因。

#### （一）世界政治格局

1991年的前苏联的解体宣告了世界两极（苏美）政治格局的终结，形成了目前的西欧、日本、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多极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但实质上美国仍决定和主宰着世界政治总方向和主动权。西方国家强势的意识形态、制度模式和政治理念通过语言、商品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中国，尤其国外认识和处理种族、族群和移民的政策、态度、行为模式及其理论体系不断被借鉴，甚至影响着中国国内民族政策制定过程与理论的发展方向。

前苏联的解体，使得对新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前苏联民族政策和理论丧失说服力，掀起了反思和批判前苏联民族理论的思潮。与此相反，稳定的英、美国家政治局势与文化影响力不断加强，英、美、加拿大等国家处理种族、族群和移民问题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大量通过文本和留学生群体大量被介绍到中国，形成了与原有马克思主义和前苏联经验截然不同的民族理论与学科体系。

#### （二）“民族-国家”角色

在个人主义与公民意识盛行的今天，“民族-国家”内部分化趋势十分显著。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泛而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风俗习惯的多民族成员的直接接触，不同民族之间出现了学业、就业等方面的竞争，很多民族个体成员在文化对比、利益竞争中强化了民族划界意识和民族归属意识，进而引发群体性认同危机，刺激“民族-国家”内部各个群体自我认同意识的觉醒，“全球化为地方自治和新型地方主义创造了需求，地方身份认同开始变得备受关注……中央分权对于全球时代的治理变得极为重要。”<sup>4</sup>

一个国家转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新的矛盾和问题多发的过程，具体反映到民族问题的复杂化与民族意识的暂时强化。由于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与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中国人”与“中华民族”意识与认同呈现出下滑局势，国家认同的建构越发举步维艰，地方主义、族群民族主义一时蔓延、扩散。正是这样的局势，诱发和引起了许多学者改变和完善现有民族政策体系和理论模式的反思性观点。

#### （三）区域社会文化功能

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快速、高效、频繁的交流 and 互动模式冲淡了各“民族-国家”、不同文化群体、族群之间的边界和文化差异性，尤其对那些弱小民族和族群文化传统意义和价值体系带来了“除魔化”（disenchantment）、“世俗化”的冲击。现代性生活方式与文化模式对传统民族文化形成了鲜明对照，区域社会文化丧失其原有功能，使得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

<sup>1</sup> 张海洋，“民族团结是中国立国之本”，《中国民族报》2012年1月2日。

<sup>2</sup> 潘志平，“中国可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环球时报》2011年9月20日。

<sup>3</sup> 吴楚克，“中国可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环球时报》2011年9月20日。

<sup>4</sup> [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郭忠华编，《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页。

族的文化前景产生忧虑。因此，民族地区学者格外关注国家民族政策与理论的变向，他们从地方与民族历史、语言、文化与环境等角度出发，考虑地方、民族群体与个体利益，反对武断、宏观、没有社会关怀的政策讨论，反对所谓“理所当然”的大民族文化与市场的双重标准，始终强调保留和捍卫少数民族政治与文化权利。

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是复杂、多变而难以掌控的过程。中国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的演变与反思是对这时期世界政治、国家角色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直接反应，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坦率、理性、多元、包容而有责任感的争论、商榷和理论思考有利于建构正确而平等对待不同文化差异及各民族利益诉求、坚持民族平等和团结的政策体系，有利于营造关注民族成员个体处境、文化忧虑的学术理念及理论关怀，更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家民族政策与民族理论模式。这样，当代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才能够成为 C. W. 米尔斯所说的将“困扰”转变为“论题”的“真实公众”<sup>1</sup>。

#### 参考文献：

- [1]孙中山著，《孙中山选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 [2]费孝通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 [3]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 [4]宁骚著，《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5]马戎著，《民族与社会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 [6]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 [7]马戎，“中国可进一步完善民族政策”，《环球时报》2011年9月20日。
- [8]马戎，“21世纪的中国是否在国家分裂的风险？”，《领导者》杂志（香港）2011年2月、4月刊。
- [9]马大正，“论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光明日报》，2003年7月29日。
- [10]郝时远，“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则不容改变（二）——评析“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一（下）”，《中国民族报》2012年2月10日。
- [11]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 [12]张海洋，“民族团结是中国立国之本”，《中国民族报》2012年1月2日。
- [13]徐杰舜，“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 [14]卢建荣著，《分裂的国族认同1975-1997》，麦川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 [15]严强，“社会转型历程与政策范式演变”，《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05期。
- [16]青觉，“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主题”，《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2期。
- [17]兰林友，“论族群与族群认同理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 [18]何叔涛，“汉语‘民族’概念的特点与中国民族研究的话语权——兼谈‘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与当前流行的‘族群’概念”，《民族研究》2009年，第2期。
- [19]关凯，“反思民族研究：理论与实践（中）”，《中国民族报》2007年3月9日。
- [20]梅新宇，“为何和谐的民族关系现在出现不和谐？”，《人民网》2012年2月28日。
- [21][美]C. W. 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年。
- [22][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郭忠华编，《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

<sup>1</sup> [美]C. W. 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2005年，第203页。

## 【论 文】

# 语音、国语与民族主义： 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谈起<sup>1</sup>

袁先欣<sup>2</sup>

**摘要：**本文从考察 1920 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入手，对常被视为以纯粹声音为途径建立民族国语的京音国音两派背后的真实冲动进行了分析。从这一问题出发，重新讨论了现代民族主义理论中从语音中心主义到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过程，分析了中国国语运动中蕴含的中国民族主义特殊性，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对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一定反思，试图为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个思想史上的背景。

**关键词：**袁先欣 民族主义 国语 文学 京音 国音 语言改革 语音中心主义 语言民族主义 村田雄二郎

## 一、小引

在五四时期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运动中，白话替代文言成为新的标准书面语与现代“国语”的创制普及这两个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看来，仍可称之为中国社会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性事件之一。正如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提示我们的，中国的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不仅与文学的革命、知识制度的更替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高度相关，而且与中国现代民族创制、民族国家制度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的论文《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赵京华译），正是从“国语”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这一角度入手，以平时为学界所注意不甚多的五四时期国语统一论争<sup>3</sup>为切入点，探讨了五四时期的语言改革运动，进行一系列颇有意思的思考。在本文中，我试图通过对村田雄二郎先生《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一文的文本细读和分析，对比补充五四时期京音国音之争的以及其他与国语统一相关的论争材料，梳理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语境和发生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希望能够就西方确立的民族主义理论范式和模型展开一定的反思；同时，基于民族主义考量的国语建制是国语文学发生的重要思想背景，因此，本文也希望能够为重新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些新的材料和方向。

## 二、民族主义还是现代化？——京音国音之争的内部冲动

### 1. 背景：晚清到 1920 年的国语统一过程概述

在正式进入对京音国音的内部问题的讨论之前，先就之前中国国语统一运动的状况进行一个简略的回顾。由于历史事实太过庞杂，本文无法将从晚清到 1920 年的各种国语统一尝试一一详

<sup>1</sup> 本文刊载于《文学评论》2009 年第 4 期。

<sup>2</sup> 作者单位：北京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yxx03@mails.tsinghua.edu.cn](mailto:yxx03@mails.tsinghua.edu.cn)

<sup>3</sup> 主要是从 1920 年 10 月到 1921 年 6 月，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为主要舞台，在张士一、陆基、黎锦熙等人之间围绕“京音”与“国音”究竟何者可作为国语统一标准等问题展开的一场争论。

述，只能将笔者认为几个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事件提出来稍作阐明。自清末受日本影响出现了“国语”以及“国语统一”的吁求以来，各种统一语言的尝试不绝于缕。不过，“国语统一”在国家层面上取得的第一个大的突破进展，是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此次大会首次选定了官方承认的注音字母，并且通过投票方式初次确定了法定读音即“国音”。值得注意的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确立的“国音”，并非以某地现有方言为基准，而是以各地代表一人一票、投票选定的一种“混合音”，南方方言中独有的入声、尖团音等均包含在这套“国音”内，因此实际上是一种由各地方言杂糅而成的混合音系统。此一混杂特色带来的后果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这套方案的弊病后来在普及国语的过程中暴露得十分明显。

1913年制定国音之后，由于政治、社会的动荡，“国音”方案迟迟未得到颁布，国语运动一度陷入停滞。1917年，国语运动与发轫于《新青年》、当时正轰轰烈烈展开的白话文运动合流，胡适写下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影响。由<sup>1</sup>于此前的国语统一尝试大都限于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小范围实践，1913年审定的“国音”又一直在教育部束之高阁，未得到正式公布和推行，因此1917年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合流，成为了“国语”概念获得大众认知的首次亮相。对许多人而言，“国语”与语体书面语也即是白话文，在意义上是重叠的。

1917年以后，由于社会影响和教育部内部一部分人的推动，国语统一迅速获得了巨大的成果。1918年，教育部终于公布了1913年审定的“国音”以及标注此种“国音”的注音字母；1920年，教育部下令，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具体内容是小学一二年级必须教授注音字母与“国音”，从前“国文”课讲授的文言文改为语体文（也即是白话文）。毫无疑问，在小学改“国文”为“国语”，是一种推广国语的措施。不过，由于当时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操此种混杂式“国音”的人群，又同时因为作为语体书面语的“国语”概念此时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对各大方言区教授国语的教员而言，一个很自然的教授“国语”的方式，就是以“国音”诵读语体文，以此达成口语意义上的“国语”。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国音”自身的问题暴露出来了：由于“国音”系统的混杂性与模糊性，在具体教授普及过程中，到底如何理解把握“国音”构成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北方方言中没有的尖音、团音在南方方言中又根据不同地区有所差别，应该依据那一地区发音？入声应该按照哪一地域的音调？这些在“国音”方案中均没有清晰规定，造成了国语普及过程中的巨大困难，甚至出现了方言与“国音”乖离太大，不得不用“土音”来朗读语体文的事例。

## 2. 京音国音之争

国语统一在操作上遇到的实际困难是1920-1921年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直接背景。论争首先由南京高等师范英文科主任张士一挑起，他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国语统一问题》<sup>2</sup>，彻底批评了到此为止的国语统一思路和方案。根据村田先生的总结，张士一完全推翻了此前国语统一的步骤和办法，认为“以国音读语体文”的国语统一方法是错误和违反语言学规律的，应该先从口语统一入手，语体文是口语统一之后对口语的摹写。而就统一口语的方式而言，混杂语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应该取一特殊地区特殊人群的口语为标准，推广至全国。张士一提出，最适合作为“国语”推广标准的，就是“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口语”。与张士一相对立，陆基、黎锦熙等人则以支持混合语为出发点，质疑了张所谓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口语”内部是否具有如张所认为的那么高的同质性，指出即便是北京语内部，同样混杂不清、难以界定；

<sup>1</sup> 胡适《建设的革命文学论》，《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海群益书店，1918年4月15日。

<sup>2</sup> 此文收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第六编“国语统一问题”，中国书局，1921。本文据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

同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国家内部不同方言区之间沟通交流工具的混合语“官话”，已经具有了国语基础标准的资格。村田先生将这些围绕国语声音标准争论的主张解读为“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典型的语言民族主义表现”<sup>1</sup>，认为在张士一与陆基、黎锦熙等人“京音”、“国音”争论辩驳的背后，是“等质的语言共同体之创出如何才可能，这样一个与国民统合相关的极具政治性的问题”<sup>2</sup>，而两条不同的思路则反映出了不同的国语统一的想象。从这里出发，村田先生分三个部分详细考察了语言民族主义式的“标准国语”理念如何与中国历史、社会现实中实际存在的地域、历史、阶级偏差纠缠联系，最终在20世纪中国思想的视野里建立了国语这一近代特有的理念。在文/白的对立中，村田先生看到了“言文一致”的普遍性机制的颠倒；在方言与标准语的对立中，特定方言 → 北京话 → 标准语的国语形成逻辑与其他方言争夺沉浮的过程被揭示出来；在以张士一为代表的京音派所主张的国语概念中，村田先生发现了一种颠倒式的过程——通过对预设国语及其承担者的想象，发现和创造了民族的起源和母体——而正是在这里，近代特有的国语叙述诞生了<sup>3</sup>。

村田先生认为京音国音之争的两方皆体现了“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族主义”，这一点我是十分赞同的；尽管美中不足的是，村田先生并没有很清楚的描述出争论两方的不同路线所体现出的国语统一的想象具体为何，也未对这差异背后可能蕴含的意义进行更进一步的分析。但是，村田先生将京音派主张的、凭借已经存在的某种单一口语求国语统一的方式，归结为一种声音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其通过对文字、历史的抛弃以及对纯粹声音的追求，实现了颠倒式的民族主体的创制和“发现”，我认为这一结论做出得有点草率，有简单代入理论模型之嫌，放过了京音派主张内部的复杂性和意义。在下面展开的论述里，我希望：（1）再度审视京音派主张的内部逻辑和出发点，试图揭示其内部真正蕴含的冲动与意义；（2）重新思考作为争相对立面的京音派与国音派思路上的差异。

在张士一首篇批判此前国语统一运动的《国语统一问题》一文中，尽管张士一以强大的语音中心主义态度开场，批判以文字为根本来统一国语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但是当他论到北京话为何适于当作国语标准时，起首列出的两条理由却是：“要这种方言，最近于文字。有这个资格的，是北京语”。“要向来用这种方言的书籍报纸等类最多。有这个资格的，也是北京语”<sup>4</sup>。由此看来，北京语适合作为国语标准，并不由于它是某种抛弃了一切外在缠绕的纯粹声音，反而因为这声音与文字有着无法割断的关系。在这里，张士一的实际选择恰好与他秉持的理论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揭示出的事实是，张士一真实的出发点并不由于声音至上的“语音中心主义”理论逻辑，也不在于要彻底的否定、抛弃文字，而是要找到一种“交通便利”、能够使“全国的人说出来……彼此可以完全听得懂”<sup>5</sup>的语言，也即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语言。张士一认为从口语入手进行统一的方式优越于从书面语入手，并非出于极端化的语音中心主义逻辑，而是因为已经存在的特殊方言口语显然比当时还在形成过程中、内部模糊混杂的“国音”具有更高的内部同质性和可推广性；同时，当文字手段可能对推广同质语言形成帮助时，张士一也并不拒绝从文字那里借力一把。当张士一论证说北京话适合充当国语标准时，恰恰是因为北京话口语形式最接近当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及的白话书面语：有了已经“同质化”的书面语，口语的“同质化”当然

<sup>1</sup>（日）村田雄二郎《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赵京华译，收王中忱等编《东亚人文·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152。

<sup>2</sup>同上。

<sup>3</sup>同上，页152-163。

<sup>4</sup>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收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第六编“国语统一问题”，中国书局，1921，页10。本文据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

<sup>5</sup>同上，页2、3。

会便利很多。只有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张士一为何会在文章中出现明显的逻辑悖论，同时还对此浑然不觉。

这里需要追问的是，张士一追求的高度同质化语言，其背后指向的是什么？毕竟，同质化的语言也可以导致同质化的“国民”产生，西方经典式样的语言民族主义遵循的正是这样的逻辑过程<sup>1</sup>。不过，仔细阅读张士一的论述就会发现，张士一谋求的同质化语言，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形式上，均与西方经典式样的“语言民族主义”有所不同。首先，在目的上，张士一并没有把自己对同质语言的诉求归结到“民族”或“国家统合”等方向上去，而是视统一的国语为一种“交通的器具”，如“铁路轮船一样”，国语统一是为了提供交流沟通的便利<sup>2</sup>。在这里，张士一的想法实际上与晚清以来试图通过语言统一解决“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sup>3</sup>之弊病的思路暗合，目的在于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资本主义发展扫除语言上的障碍。在朝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官僚机构的膨胀、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使得社会流动性增加、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碰撞日益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分歧众多的方言状况对交流的畅通进行形成了不小的障碍，统一语言就成为了自然而然的需求。其次，形式上，张士一是在明确当时中国已经有了统一书面语的情况下，还执着诉求于口语层次上的同质统一；而我们如果对比语言民族主义的例子，如果仅仅出于造成民族共同感情的考虑，则实际上共同书面语已经足够敷用：无论是安德森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是霍布斯鲍姆描述的19世纪前叶的语言民族主义，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印刷语言”或“上乘文学语言”都是书面语<sup>4</sup>。很明显，张士一所梦想的，是在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空间当中，实现语言沟通的透明和彻底——这当然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生产空间，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空间并不需要执着于如此之近的距离和如此之高的同质性。

由此可见，张士一的国语统一思路，从其本身的出发点而言，与其说是一种“语言中心主义”导致的民族建构，不如说是面向现代化时，试图通过语言同质化手段为正在形成中的现代工业社会创造同质人群。基于这样的立场，我们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张士一在面对很容易转化为民族主义工具的中国音韵学遗产时，抱持的却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sup>5</sup>：音韵学遗产虽然有助于追溯“起源”，但在推广现代社会同质语言方面，对于“听今音、发今音和教今音”却并无直接有效的作用。如此，张士一否弃音韵学遗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事实上，恰恰是在作为京音派对立面的“国音派”所主张的以混合语求国语统一的方案里，清晰的凸显出了民族主义的诉求，体现了20世纪中国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艰难努力。满清遗留下来的政治版图幅员如此广大、族群如此众多、方言如此歧义，要将一个这样的复合型帝国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同质“国族”(nation)，在这其中找到一个所谓的“中心”或“起源”，

<sup>1</sup> 可参考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中第四章“民族主义转型：1870-1918”中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语言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论述，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99-116；以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五章“旧语言，新模型”关于地方方言(vernacular)与民族想象共同体构成之间关系的论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页79-90。

<sup>2</sup> 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收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第六编“国语统一问题”，页2，中国书局，1921。本文据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

<sup>3</sup> 《奏定学务纲要》，收陈元晖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页499。

<sup>4</sup>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印刷方言与同质国民想象之间关系的论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页86-87；霍布斯鲍姆对于“上乘文学语言”如何在19世纪前半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起到了凝聚民族的作用，并由此成为后来民族主义“范式”的过程也有阐明。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100-101。

<sup>5</sup> 张士一在《国语统一问题》一文中，谈到传习国语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时，特别提出“不必多费功夫在音韵的历史上”，认为学习音韵历史无助于习得“今音”，只会浪费时间，降低传习国语的速度和质量。见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收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第六编“国语统一问题”，页28，中国书局，1921。本文据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

基本是一件没有可能的事情。如此只好模仿官话的方式，以混合求之，以混成一体的方式求得整体性的统合效果——国语统一运动中影响力巨大的“从各地方言中各各择取部分混成一整体”的混合型思路，就是由此而来。当张士一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指责“国音”同质化程度还不够高、无法达成完全清晰透明的交流时，陆基、黎锦熙等人则以“大同小异的官话”已经“覆盖北部、中部、西南部的各省”，事实上已经基本构成了统合全国的普通话为由，为混合国音辩护<sup>1</sup>。正是由于这种统合性的存在，哪怕其内部混杂不堪、难于界定，推广上麻烦重重，陆基、黎锦熙们依然要坚持其为中华民国应有的标准语。同时，村田先生用来描述京音派的“颠倒式的民族主体的创制和发现”这一语言民族主义式论述，实际上也是在混合语思路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为张士一所否弃的音韵学遗产，在支持混合语的章太炎手里，正好成为了他论证湖北方言“南北相校……韵纽皆正”、适成为“夏声”<sup>2</sup>的理论依据。在这里，对起源“夏声”的寻找和投射，恰恰是由混合语思路来完成的，这进一步凸显了混合语思路内部谋求的民族统一冲动和面向。

在这个意义上再回过头来看 1920-1921 年的京音国音之争，除开表面的国语统一方式上的不同之外，京音派与国音派的差别还可以从更深一层的内部冲动的上来把握：京音派代表了朝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向的渴望，国音派体现的则是以共同语言统合国家的冲动。尽管在表面的论述上，两个面向可能存在互相重叠或不清晰的中间地带，但若从立论与侧重的方向上来看，则两种不同的冲动基本上是可以分辨清楚的。在京音派代表人物张士一那里，推行国语的目的完全从实用论的角度来阐述，几乎完全未涉及国族认同、统一等问题；而这一思考角度呼应的，实际上就是晚清以来试图通过共同语言来普及教育、为现代化扫除障碍的语言改革方向。认为中国语言统一之后便能“进而日本。进而欧西……戛戛达于文明之极点”<sup>3</sup>，从清末到民国一直是许多语言改革者的梦想和追求。同时，对不仅仅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且是面对面的“透明的共同体”的执着，也反映出京音派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如何能够在语言变革的协助下得以实现。与此相对应，国音派明知混合国语的明显缺陷却不愿意另起炉灶，这其中除不想放弃之前多年的努力外，更深层的原因大概还在于不愿意放弃混合国语在象征、建构国族方面的优势<sup>4</sup>。

不过，我在此对两种思路进行的区分，并非要把二者之间的差异绝对化；正如村田先生所言，无论京音还是国音，事实上都能够服务于“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族主义”；京音派尽管在意识上以现代化为目标指归，但其提倡的高度同质化的口语共同体却依然可以在事实上造成同质化的民众群体，最终构成同质化的“国民”。因此在事实上，京音派与国音派均可被视为语言民族主义的表现，只不过在具体的国语统一的想象上，二者发生了抵牾。但是同时，我也并不觉得这两种思路最终依然能够统合到“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之下，能够完全消弭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我认为，中国语境里的京音国音之争，实际上正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特别的视角，可供我们重新观看西方语境中的民族主义理论内部某些“颠倒”和“断裂”。至于如何通过京音国音之争反思产生自西方语境中的经典民族主义范式与当代民族主义理论<sup>5</sup>，我将在后文中具体展开。

<sup>1</sup> 黎锦熙《国语教育上应当解决的问题》，《教育杂志》13卷2号，1921年1月。

<sup>2</sup>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收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页92。

<sup>3</sup> 李文源《〈形声通〉跋》，收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页51。

<sup>4</sup>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是，1921年修订的《国音字典》在音调上基本采取了京音调，接受了京音派的部分意见；而在此书出版发行之际，国语统一筹备会特意发函，以“北京音中所含官音比较最多，在国音中适占极重要之地位”来说明此次更改的缘由，并反复强调国音并不等于京音，“决非强全国人人共奉北京之土音为国音也”。由此我们也可以窥见国音派对于国音中“国”概念之统合性的坚持。参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页98-100。本文据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版。

<sup>5</sup> 本文中使用的“经典民族主义”来指称以法国大革命为开端的、要求民族与国家边界全等的民族主义潮流。凭借口语确认民族的语言民族主义也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代民族主义理论”本文中指近几十年来在学

### 三、国语与民族主义问题

通过此前的文本细读，我们可以整理出两个问题：首先，京音派的主张不可解读为以语音中心主义寻求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村田先生此处错误读解的原因是什么？其次，京音派与国音派不同的主张，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内部“统合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种冲动，那么，这两种冲动与经典式样的西方民族主义是否相关？通过京音国音之争，这两种冲动发生了对立抵牾，其背后的原因和意义为何？在下面的部分里，我尝试对这几个问题逐一进行一个理论上的分析回答。

#### 1. 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

如前所述，村田先生将京音派的语言统一主张，叙述为一个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逻辑式样的、以纯粹声音追求和颠倒出民族主体和起源的过程，实际上忽略了京音派内部逻辑的复杂性，是一个有问题的判断。很明显，村田先生在这里是直接套用了语言民族主义的理论阐释，而对中国历史事实内部存在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未有足够的警惕。

很容易看出，村田先生所倚赖的理论资源，是柄谷行人先生关于现代国语形成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里，柄谷先生描述了日本国语形成过程中，如何以一种“言文一致”的颠倒方式，将语音/口语抬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这一行为背后的意图，实际上是要否定作为历史存在的文字（尤其是汉文）。通过这样的过程，纯粹声音性的“大和音”被发现，民族主体得到了凸显<sup>1</sup>。柄谷先生试图通过对这个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的批判，来解构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国家起源和历史的的神话。村田先生使用柄谷先生的理论，其实是试图在中国语境内，揭示出作为一种叙述的民族起源、历史同样是被“颠倒”着创建的这一过程。在这个问题意识与批判立场上，我与村田先生是一致的，即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叙述中，同样存在欺骗性的“颠倒”；然而，村田先生未经反思直接将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套用到中国情境中，使得他掉入了陷阱，做出了与中国历史情况不符的判断。

我认为，村田先生之所以会不假思索的套用语音中心主义导致的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当然一方面大概是由于村田先生本身作为日本学者，容易为本国经验先入引导；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以语言构建民族的语言民族主义模式构成了一种经典民族主义式样这一情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尽管霍布斯鲍姆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均指出，语言之成为民族主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到19世纪末才出现在欧洲民族主义浪潮中的新现象<sup>2</sup>，但潮流振荡，影响所及，以语言、尤其是口语确认民族的方式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经典模式。不仅在日本，包括西欧法国、英国、意大利等许多国家在内，现代民族的成型与抛弃普遍性书面语（汉文或拉丁文）、将本民族口语改造为文学语言的过程均有着极深的关联。然而，中国的实际情况与这一套理论无法完全融洽的事实却提醒我们，由西方建构叙述的民族主义理论并非如其自身宣称的那般“普遍”，其中必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颠倒”和“断裂”：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构成一个重新思考和审视这一套理论的视角。

事实上，从语音中心主义到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之所以能够造成，是因为西欧、日本民族主义发生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社会背景。一方面，中世纪的西欧有拉丁语、明治之前的日本有汉文作为一种外来的、表意的“普遍性书面语”，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当地方方言崛起之时，

---

术界出现的针对经典民族主义进行反思、批判的一系列学术成果。

<sup>1</sup> 可参见柄谷行人《内面之发现》、《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等论文，收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sup>2</sup>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10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页79-82。



这个外来的、书面性的普遍性语言就构成了一个“他者”；在此一“他者”的映照之下，新生的“民族性”就必须要从与外来的书面语相对的“口语”中寻找和获取，由此来获得自身民族性的定义和统一。本居宣长在假名中找寻只属于日本的“物哀”的民族性，西欧民族将民族的“血脉”和“根”的意识投射到语言和口音之中，皆属于这样的情况。在这个过程中，是特殊的历史过程将民族、口语整合到了一起。通过对作为“外来的”、“书面的”普遍语言的双重否定，同时作为“民族的”、“口语”的新共同语得以诞生。与此恰成对照，在中国的语境里，前现代中国使用的普遍性书面语文言文，是由中国内部自发产生的，并不具有外来性；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取代，虽然有语音中心主义的因素蕴含其中，但也不是口语/口音对文字的绝对否定，而是一种新的书写系统对旧有书面语系统的取代。在这里，构建统一民族性，不是通过对外来“他者”的否认来达成，而是需要从自身历史（以及与历史深深缠绕的文字）中找寻资源；对纯粹声音的重视则更多的出于实用方面的考虑，导向了现代化的诉求。因此，在中国的个案里，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不能一以贯之。在这个意义上，从中国经验出发，就可以看出，位于西方民族主义叙述中心位置的语音中心主义→语言民族主义这一逻辑，实际上是特殊历史社会环境的造物；由此，依靠这一逻辑成立的语言民族主义模式的“普遍性”，也就被破除了。

## 2. 中国语言民族主义

在前文中，通过对隐藏在京音派与国音派主张内部逻辑的考察分析，确认了隐藏在京音派背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的冲动及国音派内部“统合认同”的面向。那么，对这两种不同的冲动应当作何理解？就我个人看来，体现在京音派与国音派中“统合认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种冲动，实际上与经典民族主义模式里包含的两重面向相契合。根据霍布斯鲍姆的论述，经典民族主义模式肇始于法国大革命，其核心在于国家=民族=人民<sup>1</sup>：一方面，国家与民族在地域范围上相重合，一个国家内理论上只有且只有一个民族，这样国家对国民的统合、国民对国家的效忠问题就得到解决，国民效忠于国家，等于服从民族共同体意志。另一方面，单一民族的同质性保证了人民内部的同质性，于是平等的现代公民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都能够得到实现。而通过既是国家主权主体、又是人民全体的“民族”这一概念，两者铸合成为了一个整体。当霍布斯鲍姆论到民族主义以一个方法成功地同时解决了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重大问题<sup>2</sup>，他实际上也已经触到了民族国家机制内部蕴含的两重面向这一事实。

语言民族主义与此同构，一方面，民族间共享的“国语”能够唤起同属一个共同体的感情，增加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共同的语言加速了社会同质化的程，促进了现代同质公民社会的出现。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比照发生于1920-1921年的京音国音之争，争论的两派恰好代表了这两个不同面向：国音派更多的偏向统合认同的目的，京音派的主张则基于追求现代化的立场。

在此意义之上，村田先生认为京音国音两派均体现了“以语言为媒介创出国民”的“语言民族主义”，我认为这个大判断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语言民族主义的大框架下，此处仍然存在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与西欧乃至日本民族语言成立的过程不同，中国在确立了作为国语书面语的现代白话文之后，却在“音”的问题如何取舍上发生了歧异。如果说对西欧乃至日本而言，某种特定语言能够同时统合囊括“统合认同”以及“追求现代化”两个向度，那么在中国语境中，这一问题又经由确立何种“音”的争论，构成了对立抵牾。在此值得追问的是，造成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sup>1</sup> 1. 公民效忠问题；2. 现代国家如何建立对每个个体公民的直接监督管理的机制，以及在这个机制构建过程中遇到的语言沟通问题。参见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一章“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中相关论述，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17-22。

<sup>2</sup>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80-81。

以我个人浅见所及，我认为，原因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考虑。首先，中国从前现代社会朝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并非简单的创造“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将包含了多种民族、不同地区的复合型帝国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过程。在这里，帝国结构成为了一个无法忽略跳过的背景与前提。表现在语音问题上，就是“国音”对帝国语言遗产“官话”的继承：正是由于要将一个内部差异巨大的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代表了地域广袤、民族众多“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官话/国音才成为了中国民族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国音”无论从其混杂、模糊的语言特色，还是其包容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方言、民族的政治内涵来看，均与西方语言民族主义意义上基于种族性或单一起源的“民族语言”有着深刻差异，它并非“中华民族”这一实体民族的民族语言，而是含义复杂的“中国”象征。前现代帝国历史、官话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现代语言变革在处理建构民族认同的问题时，采取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第二，中国语言本身的特质也是应当被考虑进来的一个因素。中国语言文字的表意性以及象形汉字的存在，使得中文系统中书面语与口语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疏离。口语可随时空、地域发生巨大变化，书面语却能够在长时期内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因此，尽管地域庞大，民族、方言众多，但凭借全国范围内通用的汉字、文言文甚至白话文，交流沟通得以实现。京音国音之争中关于取何种“音”的争论，也基于这样的语言现实：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1920年代，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学和“国语文学”已经基本取得大众认可，现代白话文作为标准书面语得到了官方的确认。因此，争论的核心内容并不在于如何造成“国语”，某种程度上反而变成了以何种方式读出“国语”。国音派给出一套混合各地方言的“国音”方案，京音派则将实用上更胜一筹的北京音抬上了桌面；不过，从根本上而言，两种思路的背景和出发点，都是已经存在的白话文书面语。更有趣的是，京音派虽然高举语音中心主义的大旗，但其选择北京话的理由，恰恰是其与已经通行的书面语白话文最为接近。在这个意义上，书面语或“文”在中国的现代语言改革运动占有的核心位置、语言运动与文学革命之间的紧密关系被呈现出来了。

第三，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也在于1920年代的中国，代表国家强力的一整套操作机制还未完全成型。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普通话”凭借政治的力量得到了最终确立承认，其内部就是在音调问题上遵循了京音派的单一口语主张，在词汇语法问题上取国音派混合语主张，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两个面向的统合。不过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虽然在这里提出国家强力机制是京音国音之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我并不认为它可以完全抹杀京音国音之争中反映出来的中国语言民族主义的特殊性问题。“普通话”尽管在口音问题上基本取了京音的主张，但“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也非一种排他性的民族语言，在作为国家内部各民族、各方言地区通用语的层面上，它依然延续和保留了官话、“国音”的内涵。

### 3. 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语境

如前所述，作为帝国语言遗产的官话系统以及中文本身的语言特质两个因素，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语言民族主义，使其呈现出了特异的风貌。与此结构类似，被这种语言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范畴本身，其面相也与西方式样的“民族”颇为不同。“中华民族”由国家内部不同的多个民族组合而成，将这些多元群体统合为一体的，并非单一纯粹的族群起源，而是多民族在长时期内共同参与同一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过程。因此，在中国语境中，无论是“国语”还是“民族”范畴，其内部均存在一个复合结构；在普通话或者中华民族概念支撑包裹的骨架下面，不同民族、地方方言等多元性因素实际得到了认可与包容。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的语言民族主义与民族建构结果。

19世纪以降，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国家成立的基本原则，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时至今日，世界俨然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世界。然而与此同时，民族内部对少数民族的压抑、强制同化，民族之间的冲突流血，也成为了近两个世纪以来屡见不鲜的场面。在以安德森、盖尔

纳、霍布斯鲍姆等理论家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中，检讨反思由民族范畴、民族主义带来的对多样性的压抑，甚至强制同化造成的问题，就构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意识。安德森等人之视民族为一晚近的建构产物，正是为了说明，民族并非一个自然自在的范畴，民族提供的一整套原则也并非天然合理。由此建构论式的民族主义理论出发，近二、三十年来对于民族问题的探讨多集中于解构已建立成型的“民族”，力图揭示出其背后对多元、多样性的压抑过程，来开放历史的其他可能性。柄谷行人教授在谈到日本国语问题的时候，正是以这样的问题意识作为基本关照；此一视角也影响到了村田先生对于中国问题的解读和思考。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民族”范畴的建构性与压抑性当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但是与此同时，更引起我兴趣的却是，无论是在国音、普通话代表的语言问题上，还是中华民族范畴代表的民族本身内涵上，中国都在同质性的框架之下，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包容、保护内部多样性积极的因素。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我们一味仅仅注目于建构与压抑的问题上，是不是过于顺应西方理论的思考理路，而放过了由中国语境可能展开的理论可能性？

在这里，我希望通过重新将中国民族主义中存在的“统合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个向度，与西方经典民族主义中的类似结构进行比对，来尝试思考和回应这一问题。如前所述，在中国语境中，“统合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这两个民族主义制度内部的向度被区分开来，并通过语言问题中关于京音、国音的讨论发生了冲突辩驳。与中国恰成对照，在西方民族主义历史中，认同、同质化人群、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等因素却完全纠缠在一起，不可做截然的区分。不过，在这一个各种因素互相缠绕、互为因果的过程里，同质化因素起到的贯穿作用依然是清晰可见的。同质化构成了西方民族概念其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民族辨认自身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同质化也是民族主义时代政治认同的基础：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在于确认“我们”同样归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由此，代表此共同体的国家机构才是合理合法的。同质化的概念贯穿了民族范畴以及依此获得合法性的现代国家制度，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面对必然呈现出无数多样性与多种层次的现实社会时，为什么民族国家要劳心费神的进行各种同化手段，有时甚至不惜采用暴力：对同质化程度的质疑会直接导致对民族性的质疑，进而威胁到整个国家的存在根基。

与西方民族主义的情况相对比，中国语境中“统合同”与“为现代化准备同质人群”两个方向构成清晰区别、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两相对立的事实，实际反映了同质化并未在此结构中成为贯穿性的因素。在中国语境中，同质化因素更多是出现在促进现代化工业社会出现的层面上，而在国家政治的层面，统合同出发点不在于确认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单一性，而是要把复合帝国体制之下的多民族广阔疆域以最大可能限度的统合到新的意识形态框架下来。在这里，作为现代国家合法性前提的“民族”原则虽然被接受，但实际的处理中，前现代的政治共同体、以及对此共同体的认同，依然发挥着主导性的力量。由此，才锻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面相。

在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论述里，国家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导致强迫同质化、压抑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霍布斯鲍姆指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家如果不进行内部的同化，就有面临少数群体举起民族大旗反抗之虞，因而同质化操作机制就成为了必要<sup>1</sup>。安德森更直接分疏了群众性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认为官方民族主义是积极性的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其出现是已经存在的国家为了保证自己屹立于民族主义洪流之中不倒而为自己披上的外皮；并以俄罗斯、泰国等国家历史为例，说明由于前现代国家并不存在单一民族样式，这种官方民族主义又会导致国家启动强制同化的机制<sup>2</sup>。不过，我在这里希望指出的是，这些国家采取强迫同化操作机制，并不是因

<sup>1</sup> 参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页92。

<sup>2</sup> 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吴叡人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9，页95-124。

为它们坚持自身的多民族框架，而恰恰是这些国家关于自身的想象已经被同质化贯穿，完全接受了民族主义关于同质化作为民族根基、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理念。只有在彻底认同了民族国家的国家形式之后，这种同化逻辑才成为可能。而正如前所分析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建构民族观念中保留部分包容多样性的因素，就是因为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并没有接受同质化因素作为统合认同的基本出发点，也即是说，没有彻底接受民族国家的一整套原则形式。在建构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中，作为前现代国家政治形式的帝国建制依然存留着影响，成为民族国家政治形式之外的另一种方案，构成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建制的参照和来源。在西欧，基于同质化人群的“民族”概念已经是一个先决条件，民族主义运动的意义在于将这个民族扩张成国家，使其具有国家框架；而对中国而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保护已经存在的政治共同体是首要任务，因此民族概念是基于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结构而成型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强迫同质化实际上是内在于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式的逻辑，不能仅仅归罪于多民族的前现代国家试图维持自身的努力；而那些多民族前现代国家千方百计要向同质民族靠拢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民族式样的国家已经成为了现代世界唯一合法的国家形式。在这独一无二的意识形态笼罩下，所有的逻辑、多样性都被民族主义收编了。

在这个基础上，我认为中国语境中特殊的国语概念和民族概念可能存在的意义大概就在这里：普通话和中华民族的范畴，其内部还包含了与民族国家形式不同的、别样的国家形式所留下的痕迹与影响。而在民族主义已经得到大量反思的今天，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也许能为我们打开一扇面向新的未来的窗户。

#### 四、结语

作为中国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920年代的京音国音之争尽管看似一场典型语言民族主义式样的通过语言诉求建构民族的运动，但仔细的分析则暴露出了京音国音争论双方所代表的不同立场。其中，与我们所了解的语言民族主义的惯例不同，要求以某种较为单纯的口语来作为国语的京音派背后，实际上的指向是要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准备条件，并没有直接诉诸民族上的要求；反而是在混合语思路的国音派那里，建构民族的意旨表现得十分强烈。从这个特殊的争论场域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当代民族主义理论中关于语音中心主义与语言民族主义的逻辑关系实际上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同时，京音国音的争论也暴露出了中国语言民族主义的特殊性，这特殊性则是由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作为前现代中国遗产的特殊官话系统等因素造成。最后，“国音”、“普通话”、“中华民族”等范畴虽然是在民族主义的大框架下出现成立的，但由于前现代中国的帝国建制，这些范畴内部都包含了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的、包容保护多样性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反思西方经典民族主义范式以及当代民族主义理论，中国的个案也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国语文学的问题，一直与国语的成立、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话题紧密相关，民族主义方向上的考量构成了国语与国语文学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京音国音之争的问题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国语文学牵涉不多，然而在京音国音争论双方的背后，一个关键的构成因素实则在于以白话文为基础的国语文学之成立。在这个意义上，京音国音争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如何读出书面国语文学的问题；白话文与国语文学在中国现代语言改革运动中占据的关键性位置由此可窥见一斑。本文对京音国音之争与民族主义的讨论分析，也希望能够为重新思考国语文学提供一些新的背景和角度。

## 【论 文】

# 莫把汉学当国学<sup>1</sup>

曹 兴<sup>2</sup>

中华民族文明的复兴成为党的十八大的主旋律之一。把十八大精神落到实处，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包括识别国学与汉学、汉学与儒学的区别，弥补民族研究学领域界汉族学研究的空白，防止大汉族主义在潜意识层面的恶性膨胀。

## 一、混淆汉学与国学的危害性与汉族学空白

在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不应把汉学视为国学。中华民族文明要复兴，复兴的内容不止是于汉学，也包括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另一方面，以往中国民族研究领域的一个巨大缺陷就是汉族学的空白。在非民族学界即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史学界等有一个巨大的误区，即认为汉（族）学即中国学，汉族即中华民族。其实，汉学是中国的国学之一，也还是国学之一，而不是国学的全部。汉学与国学的混淆必定存在着很大的弊端，甚至是隐藏着很大的危害。

当中国和平崛起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内的民族团结问题，其间要慎防大汉族主义在潜在形态的盛行。当然，混淆汉学与国学不能被视为有意识的大汉族主义的表现，但不能否认这种误解背后，隐藏着潜意识深层的大汉族主义意识，潜藏着对汉学与国学应予区别的重大无知。这种无知，无论是对中国的国学，还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甚至是对汉民族学，都是不公平或不公正的。

在世界民族冲突历史上，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有那些严重的民族冲突（包括宗教冲突）往往是主体民族主义泛滥的结果。美国的 WASP 人（美国的主导民族，即信仰新教、讲英语的白种人）对非洲裔黑人、亚裔、拉美裔人的歧视，正是美国主体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俄罗斯的车臣问题是车臣民族分裂主义和俄罗斯主体民族主义互动的结果。此外，英国的北爱尔兰人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问题、南亚斯里兰卡的僧泰冲突及其历史上僧迦罗主义的盛行、印巴冲突中的克什米尔人问题、以及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人问题，都分别显露出英国、西班牙、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主体民族主义倾向。可见，主体民族主义问题绝不是少数国家的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中国和上述国家的情况不同，国家采取向少数民族倾斜和照顾的民族优惠政策，体现在计划生育、大学录取等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没有大汉族主义的现象，把国学归于汉学，无疑就是这种大汉族主义在潜意识或无意识层面的表现。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用汉学偷换运国学概念的做法，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起码脱离不了偷运大汉族主义的嫌疑。

## 二、正确处理反思国学、汉学、儒学、孔学的关系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国学在国内外也被推到了现代人类文

<sup>1</sup> 本文刊发在《中国民族报》2013年1月4日第6版。

<sup>2</sup>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邮箱：caoxing1865@sohu.com.

明发展的前台，也表现出正负两方面现象。一方面，孔子学院的在国内外纷纷建立，激发了孔学、国学的发展。孔子学院有如雨后春笋般在全世界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从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截至2010年10月，全球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96个国家和地区。国外孔子学院的建立也极大地激发了国内儒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世人的意识层面，普遍存在着误把国学视为儒学，甚至误把国学视为孔学，或者误把国学视为汉学的观念。

应当承认，孔学是儒学，儒学是汉学，汉学是国学。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国学就是汉学，汉学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孔学。因为，国学包括汉学，但不止于汉学，还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汉学包括儒学，但不止于儒学，还包括道家、法家、墨家等更多诸家文化的学问；儒学包括孔学，孔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自汉代以来，儒学发生了无数次的发展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两次就是从孔子的仁礼之学发展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和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孔学最大的缺陷是世界本原的不足，宋代程朱理学是儒学，但吸收了道家和佛家追问本原的思想成就，虽是儒学，但已不再是孔学了。

因此，从逻辑关系上看，国学、汉学、儒学和孔学是从大到小的包含关系——国学包含汉学，汉学仅是国学之一；汉学包括儒学，儒学仅是汉学之一；儒学包括孔学，孔学仅是儒学之一。这是国学、汉学、儒学和孔学的逻辑关系思考。此外，从孔学和儒学的世界影响来看，也不能认为儒学就是（中）国学，而应认定儒学是多国治国的思想和方略。儒学在韩国、在日本早已成为齐家治国的方式和做人规范。儒学在欧美，甚至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无论是在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及现实层面上看，我们都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国学仅仅是儒学或汉学，更没理由把中国的国学仅仅归于孔学或儒学。

### 三、误把汉学当国学的历史成因

“误把汉学当国学”的想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汉族及汉学形成的历史极为复杂。汉族与汉学本身就是多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不是纯粹单一民族文化的产物。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方面，汉族是多族文化、多民族血液融合的产物。汉族由华夏族发展而来，其形成就是多元民族融合的过程，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夏商周既是三个朝代，同时也是三个族群（部落民）的聚合。周人本是小民族，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因担心当时大民族“商人”对当时统治和管理的合法性，所以建立“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法制度。

第二方面，在华夏民族形成后，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通过通婚、通商、长期移民等方式，一些周边民族自愿加盟到中原，与华夏族混血、融通为一体。从秦汉到明清，汉族进一步融合了更多的其他民族成分，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方面，在古代，中原政权与周边政权的纷争不断，相互之间“有边陲，无国界”，边陲与国界的界限是经常变动的。甚至当时最强势的民族，如蒙古族和满族，并未止步于与中原的纷争，一两度入主中原，建立起了元朝和清王朝。其历史后果是，政治上军事上统治了中原，而在文化上则更多的汉化了。另外，中原周边民族为了向中原文化靠拢，证明自己政权的正统，有的少数民族的首领谎称自己也是汉族的后裔。如，第一个在北方建立后汉王朝的刘渊是匈奴人，他称自己是汉朝公主的后代，汉朝的皇帝是他的舅舅。对此，《晋书·载记·刘元海》史料有证，“新兴匈奴人，……汉高祖以宗室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这

种现象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基于上述三个方面，随着历史的演进，从夏商周到明清，汉族血液和汉族文化越来越不纯粹，越来越多地融合了周边民族的血液，越来越多地吸收了周边民族文化、特别是周边民族文化中那些实用性很强又很先进的成分。由于这种外来民族及其文化资源的加盟，使得中华民族有如不断滚动加大的雪球，不断加速了汉族及其文化的发展。这种历史运动，自然会造成某种历史的误解，即把汉族误认为是中国人，汉学就是中国学。如果从民族自称和他称的视角看，一方面汉族人自己自称为中国人，称汉学是中国学。另一方面，有些少数民族（无论是在中原之外居于中原周边的少数民族，还是已经移民至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加盟，也把自己称为汉族人，自愿同化为汉族文化之中。

如果考证具体的文献，不难发现，早在中国古代的周朝，就有把华夏当作中国的说法。《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其间把“中国”与“戎夷”并列起来。此外，民族学界和史学界，对于华夏族的看法，素有“五方之民”与“先有四夷后有华夏”的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这种矛盾并不是主观的误判，而是客观固有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事物的本质就是矛盾，矛盾的发展过程是从对立到统一，再从统一到分裂或升级为更高级的矛盾。早期华夏人居住的地区是“四夷”之间的中间地带，地理环境最好，文化融合最多，文化形态最先进，自然就成为中国文明的发展中心，进而吸收着周边更多的民族。可以说，华夏民族本身就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从这种意义上讲，汉族并不是原生态民族，而是衍生性民族。在历史上的中国地区，各部落民之间，通过战争、通婚、通商等方式进行的交流等方式进行融合，本身就是一种互通有无的文化加盟。因此，在中原地带周边，很难做到纯粹的原生态民族，而在中原地带根本不可能形成纯粹原生态民族。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才会成为汉族。因此，汉族绝不是纯粹原生态、单一民族文化塑造，而是多族文化、多民血液融合的结果。我国民族宗教研究专家牟钟鉴提出“汉族是通和民族”。他认为，中国民族的混血决定了宗教的混血。“民族的‘混血’，造成了宗教的‘混血’；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造成了多元通和的宗教模式。”从辞源上分析，“华”者“美”也，“夏”者“大”也。其实，这个文化之“美”和地盘的不断扩“大”，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可以说，华夏族的融合性、扩大性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王震中在其专著《简论邦国与王国》中称上古时代的中国是邦国。牟钟鉴提升为“古邦国”。刘尧汉认为，先有四夷，后有华夏：“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是先有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四夷’，尔后才有华夏。华夏者，乃由‘四夷’中的先进部分融合而成的人们的共同体也。”毛泽东也认为汉族是民族混血儿：“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期内许多民族混血成的。”

多民族融合形成了汉族，中国其他 55 个民族也是在历史中不断融合发展成了具有独特文化和传统的民族。因此，国学应该是包含 56 个民族文化的国学，不应该只是汉学。应该不断发掘 56 个民族的优秀文化，不断充实和丰富国学。

## 【论 文】

# 中国两次国学运动中的大小国学之争

励 轩<sup>1</sup>

**摘要：**本文探讨了晚清以来两次国学运动中出现的“大小国学”之争，运用族裔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理论来说明坚持“小国学”理念实质是狭隘族裔中心主义行为，不利于国学运动的发展和对中国认同的塑造，提出坚持“大国学”理念将有助于克服此次国学复兴运动中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大国学、小国学、族裔中心主义、跨学科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 2010 年对大陆高校相继建立的国学院提出了一个质疑：“国内有一些大学里设立了‘国学研究院’，但是如果在这些‘国学研究院’里只讲授汉语文流传下来的典籍和学问，那么这个‘国’字也还是可以斟酌的，也许更名为‘汉学研究院’更加名副其实。”虽然并不是所有大陆国学院都是“汉学院”，但就目前来看，绝大多数的国学院确实办成了“汉学院”。马戎教授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新中国民族政策实施以来所造成的汉族-少数民族制度性区隔。<sup>2</sup> 笔者在本文探索了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经历的两次倡导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和社会运动，即清末至民国 1930 年代的国学运动和 1990 年代以来的国学复兴运动。提出汉族—少数民族的文化区隔现象并不仅存在于目前的国学复兴运动中，也存在于新中国之前的国学运动。造成这种区隔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新中国族群区隔化的民族政策，部分也是由于倡导国学运动的知识分子有意或无意抱有狭隘族裔中心主义。同时，笔者也认为并不是所有国学运动中的参与者都抱有狭隘族裔中心主义，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构建一个更为包容的国学。进而归纳出了两次国学运动中的大小国学之争，提出了小国学理念背后蕴含的狭隘族裔中心主义，探讨了大国学理念如何帮助打破汉族——少数民族文化区隔以及如何有助于克服国学复兴运动发展所面临的其他挑战，认为中国学术界应该在这次国学复兴运动中坚持大国学理念。

## 国学概念的产生

国学一词，虽然古已有之，然而本初的意思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相去甚远。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礼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里“国有学”指的是一国都城中所设教授贵胄子弟的学校。国学的这一含义直到二千多年后的清末还是如此。康有为在 1886 年所撰《教学通义》便说：“至于国学，自天子、世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教之……大学者，国学之大者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而国学有二：有大学，有小学。其地，则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

而具有现代含义的国学则可能跟中国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词汇一样，来自日本。<sup>3</sup> 日本江户幕

<sup>1</sup> 作者为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候选人。

<sup>2</sup> 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 5 月。

<sup>3</sup> 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 年第 5 期；杨思信，《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研



府时代的僧人契冲（公元1640~1701）从研究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出发，开启国学革新运动，与之同时代的神官荷田春满（1669~1736）继续对《万叶集》和其他日本古典作品的研究，并提出以日本古语、古文阐明日本固有精神，反对以儒学、佛学来解释日本古代典籍。其后学者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平田笃胤（1776-1843）等人继续秉承这一思想，并身体力行进行日本国学研究。虽然参与国学革新运动不少日本学者都认同国学是日本固有文化与学术，但具体而言，又有所区别。比如契冲以之为“歌学”；荷田春满认为其范围包括国史、法制、歌学、语学；加茂真渊则认为应是国史、国语、国文、法制、故实。日本国学革新运动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学极有可能借助中国留日学者学生而被借入中国。<sup>1</sup>

由于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而避难日本的中国政治活动家、学者梁启超在1902年致函曾充任驻日外交官的学者黄遵宪，提出创立《国学报》，黄遵宪回信：持中国与日本较，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sup>2</sup>在他们的对话中，隐约可以看出，梁、黄二人受日本影响以国粹指称国学，这已与国学旧义完全不同。此后，倡导成立国学保存会的学者黄节进一步明确自己提出国粹保存主义深受日本影响：“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者也。昔者，日本维新，欧化主义浩浩滔天。乃于万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动力量焉，则国粹保存主义是也……文部大臣井上馨特倡此义，大呼国民，三宅雄次郎、志贺重昂等和之。”<sup>3</sup> 1904年，青年学者邓实发表《国学保存论》，支持黄节的保存国粹的主张，并将国粹之名换成国学。<sup>4</sup>同年，黄节、邓实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sup>5</sup>在国学保存会成立后两年，一批围绕在章太炎周围的留日学者学生在日本成立了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在发起书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sup>6</sup>倡导国学运动。

与日本早期国学家对国学的定义有分歧一样，中国国学运动早期发起者们之间对国学的定义也有所不同。邓实黄节认为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这个意义就其范围而言更接近于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可以称之为大国学。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以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sup>7</sup>黄节说：“夫国学者，明吾国界，以定吾学界者也。”<sup>8</sup>然而章太炎似乎更偏向于将国学定义为汉人之学，其范围更接近于美国学术背景下的汉学（Sinology），可以称之为小国学。<sup>9</sup>他提出：“为甚提倡国粹<sup>10</sup>？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说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sup>11</sup> 邓实、黄节和章太炎对国学定义的不同，在此后的国学运动中进一步激化，以致在民国学界还产生了国学是否该存在的争论。

---

究》博士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1999.11。

<sup>1</sup> 姜义华，“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上）”，《学术月刊》，2007年7月。

<sup>2</sup> 黄公度，“致饮冰室主人书”，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sup>3</sup> 黄纯熙，“国粹保存主义”，载《政艺通报》壬寅第22期（1902-12-30）。

<sup>4</sup> 邓实，“国学保存论”，载《政艺通报》，甲辰第3号（1904-03）。

<sup>5</sup> 《国学保存会简章》，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

<sup>6</sup> 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载《民报》第7号（1906-09）。

<sup>7</sup> 邓实，“国学讲学记”，载《国粹学报》第2年，第7号。

<sup>8</sup> 黄节，“《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

<sup>9</sup> 章氏此后还在国学运动引入了另一术语国故，将文字、音韵、训诂、诗赋、诸子学等纳入其中。

<sup>10</sup> 虽然国粹很容易被理解成一国文化的精华部分，而国学则是中性的词汇，但是中国最早一批国学运动提倡者似乎常常将二者混用。

<sup>11</sup>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载《民报》第6号（1906-07）。

## 大小国学之争

虽然邓实、黄节和章太炎等人对国学进行了初步的定义，但是他们的定义却非常笼统。邓实、黄节说国学为一国所有之学，然而到底什么才算一国所有之学，其研究方法应该是什么，他们并未给出非常可信的阐释。章太炎虽然比起邓实、黄节前进一步，提出了稍微明确国学研究范围，但对于应采用哪些研究方法，仍然语焉不详。他们有时也常将国学、国粹、国故混用，未作具体区分。

晚晴国学运动早期发起者对国学定义的不完善给了后来人以更多的发挥空间。如学者柳诒徵认为：“予对国学之界说，必非佛学及洋学，……须从古先圣贤，未受佛学洋学之熏染时讲清，而又包括后来之汉学、宋学，以及今世所讲政治、经济、财政、社会、教育等，始可言国学。”<sup>1</sup>可见，他似乎将学问是否是汉人所创作为界定国学的标准，非源自汉人的学问即使是佛学都要被摈除在外，对于时限，柳诒徵倒不在乎。学者蒙文通将国学范围缩小到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他称“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派别很多……最风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sup>2</sup>史学家顾颉刚则认为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sup>3</sup>甚至还有人认为：“国学者，（中）国文学而已。”<sup>4</sup>以上这些定义或是将国学局限于汉人之学，或是将之局限于一科之学，均不出小国学的范围。

与柳诒徵等人不同，民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所办的国学门坚持大国学的主张。北大国学门称：“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sup>5</sup>清华《研究院章程》则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sup>6</sup>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更是称：“今宓晓以本院所谓国学，乃取广义，举凡科学之方法，西人治汉学之成绩，亦皆在国学正当之范围以内，故如方言学、人种学、梵文等，悉国学也。”<sup>7</sup>按照吴宓的理念，大国学不仅其研究范围要突破汉文化的藩篱，就连研究方法上都要突破义理词章考据。

吴宓发展邓实、黄节的大国学观点，还得到了当时不少学者的认同。语言学家郑奠认为：“愚谓国学之范至广，凡域内固有之学，无间于心与物皆隶焉。”<sup>8</sup>学者胡适借用毛子水的国故学术语，也给国学做了一个定义：“‘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sup>9</sup>蔡尚思也明确提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sup>11</sup>有学者更是坦言：“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sup>12</sup>

<sup>1</sup> 柳诒徵，“国学之界说”，《柳诒徵说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57页。

<sup>2</sup> 蒙文通，“经学导言”、“经史扶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成都：巴蜀书社，1995.12。

<sup>3</sup> 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sup>4</sup> 邵祖平，“序”，《国学导读》，商务印书馆，1947年。

<sup>5</sup> 《公布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布告》，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75页。

<sup>6</sup> 《研究院章程·缘起》，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76页。

<sup>7</sup> 吴宓，“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清华周刊》第371期，1926年3月19日。

<sup>8</sup> 郑奠，“国学研究方法总论”，洪北平编《国学研究》，上海民智书店，1930年，第3页。

<sup>9</sup> 对于胡适将国故学省称国学，不少学者并不同意。参见罗志田，“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sup>10</sup>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第6页。

<sup>11</sup> 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第5页。

<sup>12</sup> 《北大出版之两种季刊与史学》，南京高师史地研究会编《史地学报》第2卷第4号，1923年6月。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质疑国学存在的必要。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说：“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据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sup>1</sup> 报人曹聚仁也明确提出了反对国学一说：“国学无确定之界说，无确定之范围，笼统不着边际，人乃得盗窃而比附之。故为澄清学术界空气计，不能不轰国学。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sup>2</sup> 有留洋背景的傅斯年在其《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坦言：“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祥，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等题目？”<sup>3</sup>

如果说柳诒徵、吴宓、胡适等人对国学定义的争论乃是因邓实、黄节、章太炎对该词定义的不完备所致，陈独秀等人对国学的否定可能是受到新文化的影响。袁世凯当政时期在中国大力推行尊孔崇儒政策遭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感。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民主与科学，批评尊孔崇儒。而国学定义虽各家有争论，但大部分人都肯定将儒学纳入国学范畴，自然也就列入批判之列。此外，欧美学科划分体系也可能使受其影响的学者起来否定国学。毕竟，欧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里面，文史哲政经农工商数理化各科分得很清楚，国学并无立锥之地，更无法与这些学科并列。

民国时期学界大小国学的争论，随着1930年代国学运动的衰歇而渐渐熄灭，而北大清华国学门以及在国学运动中相继产生各大高校国学院纷纷关闭或改名。此后，国学运动便沉寂了半个多世纪。

## 争论再起

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的数次政治运动以及之后的十年文革，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受到人为压制，传统文化也遭摧残，用于指称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国学被人们遗忘。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十年，经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得以呼吸一口外面的空气，知识分子便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中国之外特别是西方社会。然而1980年代末的政治事变，给中国的开放造成了不少阴影。这极有可能促成不少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自己，特别是原先被批判的传统文化，进而促成1990年代以来的国学复兴运动。

与清末和民国时期学界对国学定义存在争议一样，在这场国学复兴运动中，同样也出现了大小国学之争。有部分学者将国学限定为汉文化甚至是四部之学，如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毓庆说：“国学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载体，国学分经、史、子、集四科。”<sup>4</sup> 又比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贾松青声称：“儒学是国学的主体和精魂。”<sup>5</sup> 成立于2010年的武汉大学国学院，在其本科生培养方案中，所设课程几乎都不出四部学之外。<sup>6</sup> 小国学理念在普通民众中更是有不少有意或无意的支持者，他们往往将《论语》、《孟子》等传统汉文化中的典籍等同于国学内容，以为阅读这些典籍便是在复兴国学了。

<sup>1</sup> 陈独秀，“寸铁·国学”，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6-517页。

<sup>2</sup> 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册，上海书店，1991年（据群学社1927年）影印，第92-93页。

<sup>3</sup>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10月。

<sup>4</sup> 刘毓庆，“国学的基本素质及其当代意义”，《山西大学学报》2006.06。

<sup>5</sup> 贾松青，“国学现代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社会科学研究》2006.6。

<sup>6</sup> 《武大“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实施细则（草案）》武汉大学国学院<http://guoxue.whu.edu.cn/?p=90>

在中国学术界，还有一批学者承袭吴宓等人的大国学理念，即突破汉文化的界限，将国学放宽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层面上去。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季羨林认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56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又共同构成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sup>1</sup>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立文说：“国学既是中华多民族共同之学，不能仅看作是汉民族之学，也是全世界华人之学。国学不是民族中心主义，不是排外之学，而是容外之学；不是闭门之学，而是开放之学，不是固守之学，而是发展之学。”<sup>2</sup>成立于2005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时秉承了这一理念。在国学院的专业方向和课程设置中，不仅包括了传统四部学，也涉及到了藏学、蒙古学、西域研究等学科，学生甚至有机会学习藏文、满文、梵文等文字。

除了大小国学之分，不少学者或机构也会将二者混淆，即表面上谈大国学，但其实质内容却是小国学。江西城市职业学院讲师唐丽莉及江西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徐佩瑛在他们的论文《国学的当代思考及其传承路径》开头称：“国学，顾名思义，是中国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然后，接下来他们通篇只是谈儒家经典中几个名词。<sup>3</sup>在中国最大的国学门户网站国学网解释什么是国学时，先称：“‘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它包括中国古代的思想、哲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旁及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等诸多方面。”但又称：“国学的分类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四库全书》的分类方法，它把国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另一种是按内容分类，开始分为三类：义理之学，阐明事物道理，也就是哲学；考据之学，从事历史研究，也就是史学；辞章之学，从事诗词散文以及章奏、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的，就是文学，及今天所说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sup>4</sup>这种将中国文化或中华文化等同于汉文化的现象并非鲜见，在许多汉人中，几乎已成定式思维。

1990年代以来国学复兴运动与晚清民国的国学运动有极相似之处，甚至这场国学复兴运动中也出现了对国学的广泛质疑。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梦溪援引民国学者马一浮的观点，认为：“国学这一概念，是当我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时期应时而生的一个特指名词，是‘一时代的名词’（钱穆），是‘不甚恰当的名词’（马一浮）。如今历史已进入21世纪，我们在扬榷古今、斟酌中西、权衡利弊之后，主张‘广义笼统’的‘国学’应该缓行、少行乃至不行，庶几不至于有背统趋新之嫌罢。”<sup>5</sup>已故作家舒芜更是激烈反对国学复兴运动，他说：“从网上可以看到，许多人年纪不大，水平也谈不上，开口闭口大侃‘国学’，一张嘴就是我们的民族传统啊、‘国学’根基啊等等，其实也都是糊里糊涂、玄玄乎乎的，从没仔细想一想，这个‘国学’里面究竟有些什么货色，有哲学吗？有史学吗？有文学吗？有自然科学吗？等等，不能说没有吧？如果有，为什么不归到各门学科里面去呢？非得要说‘国学’不可呢？唯我看来，媒体上津津乐道的所谓‘国学’，也就是指能够看懂一点古书，能够做一点古诗词，能够写两笔字而已吧，笼而统之的就这点东西，实际上空洞得很。”<sup>6</sup>然而他们的质疑看起来并未超越傅斯年等人，刘梦溪并未提出新的见解，舒芜反对所用的理由一是国学内容都可划入传统学科划分中，二是国学被庸俗化。

## 国学运动背景下的族裔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在探讨晚清民国国学运动兴起的原因时，将之归结为抵制西方列强文化入侵的西方威胁论极

<sup>1</sup> 《大国学》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4/15/c\\_1235003.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4/15/c_1235003.htm)

<sup>2</sup> 张立文，“国学的度越与建构”，《理论视野》2007年第1期。

<sup>3</sup> 唐丽莉、徐佩瑛，“国学的当代思考及其传承路径”，《江西社会科学》2008.12。

<sup>4</sup> 《什么是“国学”》国学网 <http://www.guoxue.com/?p=219>

<sup>5</sup> 刘梦溪，“‘国学’一名‘恐将不立’”，《青年教师》2008.08.11。

<sup>6</sup> 舒芜，“‘国学’质疑”，《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

为流行，不仅早期发起者黄节赞同“欧化主义浩浩滔天”，后世学者也对此观点也大力支持。<sup>1</sup>然而西方威胁论却不能解释为何民国 1920 年代欧美列强对中国威胁退去的情况下，国学运动却蓬勃发展，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何在没有亡国危机的当下，却再次兴起了国学复兴运动。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入另一个概念——族裔中心主义来解释国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族裔中心主义是美国耶鲁大学首位社会学教授 William Graham Sumner 提出的，指的是人们看待事务以自己所在群体为中心，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所有他者。Sumner 进一步认为，族裔中心主义往往导致人们为自己所在群体产生优越感，并轻视外来者。<sup>2</sup>族裔中心主义并不一定是负面，只要有一个他者的产生，便极有可能导致族裔中心主义行为的出现，尽管通常情况下，族裔中心主义行为并不意在损害他者。

产生族裔中心主义行为所需要的他者，既可以是真实面对的，也可以是想象出来的。晚清中国学界所处的局面便是面临一个强大的他者——西学。尽管这个西学也存在着想象成分，连西方人都未必承认此术语，却在中国极为流行。早在国学运动产生之前，张之洞在其 1898 年发表的《劝学篇》中即已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很好的制造了自我和他者的对立，虽然何谓中学，何谓西学很难进行严格的定义。但这种将中学和西学对立的思维，似乎给了国学运动早期发起者以启发，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若不是因为日本的影响，国学运动要改成中学运动了。

这种自我和他者的话语一直伴随着两次国学运动，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字学家胡朴安说：“国学二字，作如何解释？即别于国外输入之学问而言，凡属于中国固有之学问范围以内者，皆曰国学。”<sup>3</sup>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也常常将“国学”与“外学”相对举。1990 年以来国学复兴运动中大国学的积极倡导者季羨林先生称：“要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目的绝不是自吹自擂，而是为了全世界文化的发展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sup>4</sup>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黄朴民教授在国学院官方网站的致辞中提出：“（国学院）成功做到了立足本土、面向世界。”<sup>5</sup>

而当自我和他者的边界模糊之后，国学运动似乎也走入衰落。1930 年代，随着中国各所西式大学学科设置渐趋完备，国学内容被纳入到各个西式学科中，国学和西学的边界也分不清了，国学运动也就衰落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中国和欧美之间遭到人为隔绝，1978 年改革开放后，经历长期封闭的自我突然又遇到了一个他者，一时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立话语再次成为时髦，同时近三十年的封闭又使得中国大学学术体系与欧美的脱节，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突然发现如何在现有学科体系内容纳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又出现一定难度<sup>6</sup>，这成为国学运动不仅在普通大众甚至在学术界能够再次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sup>1</sup> 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 年第 5 期；杨思信，《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研究》博士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 1999.11 第 61 页；林藟，“‘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及当代定位”，《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 6 月。

<sup>2</sup> Sumner, William Graham. *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Boston: Ginn and Co., 1906) P13

<sup>3</sup> 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上册，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第 45 页。

<sup>4</sup> 季羨林，“21 世纪国学研究瞻望”《谈国学》 新浪网 [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60240\\_41078.html](http://vip.book.sina.com.cn/book/chapter_60240_41078.html)

<sup>5</sup> 黄朴民《院长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http://guoxue.ruc.edu.cn/xygk\\_more.asp?id=76](http://guoxue.ruc.edu.cn/xygk_more.asp?id=76)

<sup>6</sup> 陈明：作为工具性存在的文化，其整体上乃是一个集应物、治事、立命安身诸功能为一体的复合系统，如西方文化就是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宗教神学三足鼎立支撑。经史子集之经，即儒学，是不是宗教另说，但千百年来主要是由它作为民族生命之意义提供者、作为文化认同之标志则毋庸置疑。将经学化约为哲学、文字学或者历史学、人类学，结果是造成方法的错乱、意义的遮蔽。方法错乱就是将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文化彻底对象化知识化；意义遮蔽就是无视儒学作为民族性格之塑造者、国家理想之设计者的正面意义，反而据此要求其我们在近代世界性的殖民运动中遭受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国学院成立的期待与忧虑》

<http://www.china-review.com/sao.asp?sid=108&id=16390>

## 小国学理念中的狭隘族裔中心主义

自我和他者的对立尽管会带来温和的族裔中心主义，但并非所有的族裔中心主义都是温和的，他们的对立也可能发展成极端的狭隘族裔中心主义。考察中国的两次国学运动，很容易发现这种狭隘族裔中心主义行为：即汉族知识分子排斥少数民族和忽视少数民族文化。

国学运动的发端便离不开汉人知识分子的狭隘族裔中心主义，其早期发起者们将国学运动视为排满的一种方式。作为发起者之一的章太炎，不仅是学者，更是革命家，他本人曾有浓厚排满倾向，1906年他在日本的演说时称要“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sup>1</sup>此处的种姓显然指的是汉人，这里的国也就是汉人的国，国粹则是指汉人的文化，他的演说暗示了发起国学运动乃是要动员汉人去排满反清。章太炎显然把汉人当作一个自我，将满人当作他者，言下之意，只有汉人的文化才能称为国粹，而少数民族文化进不了这个国粹的范围。受到当时反清革命的影响，不仅章太炎，甚至抱有原始大国学观念的邓实、黄节也是排满分子，他们在自己所办《国粹学报》上倡言排满。

辛亥革命的完成，使得政治上反清排满的任务也终结，反映在文化上的，便是民国国学运动极少出现反对少数民族的言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族学者们不再将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到国学之外。小国学的倡导者自不必说，即使开明如胡适者，也难脱狭隘族裔中心主义的窠臼。他虽然认为研究中国过去一切历史文化的学问便是国学，但当他应邀为清华学生推荐国学书目时，其所开列的190本书中，无一本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或研究著作。<sup>2</sup>另一位大学者，梁启超推荐的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26种，也未能超过四部之学。<sup>3</sup>当然，胡适、梁启超等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忽视极有可能是由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对这些文化缺乏了解，无论是胡适、梁启超还是钱穆等那个时候最有名气的大学者，都不会说任何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他们也极少有机会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领略那里的传统和文化。

不过，对少数民族文化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在1990年代国学复兴运动后的当下依旧广泛存在。虽然费孝通先生早在1988年便已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然而在许多普通民众眼中，中华文化依旧只是汉文化的另一个词而已，诸如将中华民族等同“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这类错误更是屡见报端。在学术界，对小国学理念实实在在的支持也不少，如某位教授所著的《国学通论》一书，各章分别是“儒学与经学、十三经、史部概论、二十五史、先秦诸子、历代子学、集部概论、古典文学概论、佛学概论、道教概论、古典艺术学、版本目录与校勘、文字音韵与训诂、天文地理学。”<sup>4</sup>若是细细去读各个章节，竟然找不到一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子。又比如某几位学者所著的《国学概要——对国学的文化解读》，把少数民族的文化一概省去了。成立于2011年的某高校国学院明确提出自己的研究生教育“将宋元史专题研究、明清史专题研究、近世制度史研究、近世学术史研究、儒学专题研究、佛道专题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术前沿、海外汉学研究设置专业主干课程与发展方向课程”<sup>5</sup>，而早于一年前成立的某高校国学院更是将自己的本科生课程限定在了四部学。

当然，直接说国学就是汉文化的学者还是比较少，狭隘族裔中心主义在目前学术界更多的是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即肯定国学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但又特别强调对汉文化的关注，特别是对儒学经学的关注。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是某位教授的观点，他说“我们讲国学。不能排斥各

<sup>1</sup>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载《民报》第6号（1906-07）。

<sup>2</sup>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转引自国学网 <http://www.guoxue.com/discord/content/hs.htm>

<sup>3</sup> 《五位国学大师开列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国学网 <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20751>

<sup>4</sup> 曹胜高，《国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06。

<sup>5</sup> 《中国史硕士学位——国学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 <http://gxy.hznu.edu.cn/jhpy/xjsjy/286395.shtml>

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各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所谓‘三教九流’都应该包括在内。”<sup>1</sup>可是他又说：“国学里面它有一个主流，这个主流是儒学；儒学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经学……我讲的是历史事实，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它所占的比重和影响都特别大，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sup>2</sup>按照这位教授的观点，包括众多少数族群文化在内的非儒学都算是次流或未流了。如果少数族群文化仅是次流或未流观点成立，那么从事这些文化研究的学者不该得到比儒学研究者更多的学术资源怕是也要成立了。

相较于小国学，国学复兴运动中的大国学理念和实践则较好避免了狭隘族裔中心主义。季羨林的大国学理念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沈卫荣教授的梦想，他和人大国学院的几位创始人一道将这个大国学梦想付诸实践。在他们的文化自我中，不仅包含了汉文化，也包含了蒙藏等少数族群的文化。<sup>3</sup>因此，人大国学院不仅从事汉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也从事其他少数族群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 国学复兴运动的未来

1990年代以来的国学复兴运动依旧面临着晚清民国国兴运动所要回答的两个拷问，一是如何取舍国学的定义，二是如何与现代大学学科体系融合。若采用小国学的理念，将国学等同于汉文化，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那么少数族群的文化就不属于中国文化，若连自己的文化都不被承认为中国文化，少数族群人士怎么会对中国有认同感。若在大国学的形式下却提倡儒学或经学是中国文化主流，那么言下之意，其他文化在中国都是次流或未流，可是对于藏族人来说，藏传佛教文化才是主流，对于维吾尔人来说伊斯兰文化才是主流。倡导儒学经学主流说进而暗示少数族群知识分子必须懂点孔孟之道方能称中国人，既荒谬，也不利于中国认同的塑造。

而真正选择大国学理念不仅有助于强化中国认同，也与中国的现实相符合。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族群组成，每一个族群都拥有自己灿烂的历史和文化，藏族有自己的藏传佛教传统，蒙古族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大帝国，维吾尔族对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是各自族群的财富，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若肯定国学是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那么少数族群文化自然是要包括在这里面的。

除了要在国学定义中进行取舍外，在国学复兴运动中还需要依照大国学理念谨慎处理相关术语的语言翻译。若不能将相关术语精确翻译，极有可能带来新的误解。比如目前流行的“国学”的翻译是 Chinese Classics，这里的 Chinese 是指“汉文的”还是“中国的”就存在歧义，如果仅指“汉文的”，那么就让人联想到国学仅指汉文典籍。这方面，我们也许可以借鉴日本学界的做法，他们采用 Japanese Studies 作为意指研究日本传统文化的国学，中国的国学不妨可以译成 Chinese Studies。又比如 Sinology 应该翻译成汉学还是中国学？在台湾，Sinology 等同于中国学、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而在美国学术背景下，Sinology 仅指对古汉语、汉文经典、哲学方法的研究。显然，大陆学术界可以采用美国的 Sinology 定义，称汉文化研究为汉学。如此一来，国学相关英文术语也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国学（Chinese Studies），汉学（Sinology），藏学（Tibetan Studies/Tibetology），蒙古学（Mongolian Studies），维吾尔学（Uyghur Studies），

<sup>1</sup> 李学勤，“我对‘国学热’的几点看法”，《北京日报》2009.10.23

<sup>2</sup> 李学勤，《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光明网。

[http://www.gmw.cn/01ds/2010-08/04/content\\_1203462.htm](http://www.gmw.cn/01ds/2010-08/04/content_1203462.htm)

<sup>3</sup> 张越，“沈卫荣的大国学梦想”，《中关村》2012年第1期。

以此类推。但以上术语译介体系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即无论是 Chinese Studies 还是 Tibetan Studies, 都不排斥现当代研究,这与研究传统中国学术和文化中的传统二字有冲突。要解决这一个冲突,笔者认为比较妥当的办法是拓展国学的疆界到现当代,一来,中国文化发展本来就是连续的,按照时间来割裂这种文化的连续性本来就不妥当,二是,疆界的拓展也可以给研究机构里的相关学者们更多的研究空间。

相比翻译等技术问题,目前国学复兴运动所面临的更大挑战应该是如何与现代大学学科体系融合。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史哲政经社划分方法确实让国学面临一个很大的尴尬,国学内容似乎都可以被以上学科所纳入,而且国学研究方法也难突破以上学科既有方法。正是因为民国西式大学学科渐趋完备,促成了国学和西学这种自我和他者疆界的模糊甚至消失,熄灭了晚清以来的国学运动。就世界范围来看,极少有国家将本国国学列为与文史哲并列的学科,作为中国曾经的老师,日本各大学甚至连专门的国学研究和教育机构也不存在。美国许多大学也并无 Department of American Studies, 他们更普遍的做法是在各学科内再细分地区研究,历史系有美国历史,政治系有美国政治,以此将美国研究纳入到各个学科。这当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而且中国大学目前比较通行的办法确实也是如此。只是这也意味着,国学复兴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国学院似乎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

如果要让国学院继续存在下去,只有按照吴宓大国学理念中的跨学科思维,突破文史哲政经社的学科划分,去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在这里,美国大学设置地区研究系的做法也许值得参考。目前美国多所大学均在地区研究系所的设置上取得了成功,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地区研究系所包括美国研究系(Department of American Studies)、东亚语言和文化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中欧亚研究系(Department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近东语言和文化系(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ultures)、斯拉夫语言和文化系(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Cultures)。<sup>1</sup>这些地区研究系都是跨学科系,意味着教授和学生不必局限于单一学科研究方法,而可以依照自己所需来选用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如中欧亚研究系学生就可以选择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或语言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系所设置促进了印第安纳大学相关地区研究的学术发展,作为美国一所普通公立大学,竟然涌现出了 Denis Sinor、Gyorgy Kara、Christopher Beckwith 等中欧亚研究领域的世界级权威。

在此次国学复兴运动中,如果大陆高校国学院学习美国高校相关系所,将自己定位为跨学科的地区研究机构,带来的好处将是显而易见。首先,有助于推动中国认同的构建。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多族群国家,中国的文化是由五十六族群的文化共同构成的。然而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语言长期以来被主流中国社会边缘化,对他们的研究往往只集中在几所民族高校,从而形成文化上的汉族-少数民族区隔。而将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等纳入国学院的专业方向设置中来,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和语言获得汉人社会的肯定,打破文化区隔,促进少数民族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利于多族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

其次,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汉文化的认识。中国数千年历史不是各族群相互独立的历史,而是各族群相互交融、碰撞的历史。在相互交融、碰撞的过程中,汉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比如丝绸之路的形成,就是汉族和西域各少数民族共同努力的成果。研究丝绸之路不仅仅有助于了解这条路上曾出现过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有助于我们认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是如何互动的。又比如研究西夏黑水城文书,不仅可以了解西夏人当时的语言文字、律法、宗教情况,也有助于明白汉文化是如何影响当时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

其次,有助于保存少数民族文化。随着经济市场化和科技进步,中国民族融合的步伐显然已

---

<sup>1</sup> 印第安纳大学 <http://www.iub.edu/academic/departments/index.shtml>



经加快。然而在民族融合加快的同时，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却也面临着危机，一些人口稀少的族群如锡伯族，自己的语言将丢失。国学院招募学者从事这些文化研究，无异于是在挽救中国宝贵的精神财富。借助国学院研究人员，普通大众也将有更多机会知道中国不只有孔孟老庄，还有宗喀巴、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也不只有四书五经，还有萨迦格言，从而使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能够在更多人心目中长存。

再次，有助于打破国内高校僵化的院系学科设置体制。当我国大陆高校还在固守传统文史哲政经社学科体制时，美国等发达国家早已开始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尽管他们还保留传统的文史哲政经社学科，但大量高校设置了不少跨学科系所，从而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术的繁荣和发展。国学院吸纳多学科人才，允许师生用跨学科方法从事研究，将是改革我国传统学科体制的开始。

最后，有助于教授和学生利用跨学科优势推进学术研究。摆脱传统学科体制束缚的师生，可以尝试用不同视角和方法去看待和研究问题。比如在研究中国古代史时，引入统计学方法、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新方法和理论的引入，将对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带来革命性变化，促使我国学术界尽快与西方发达国家高校跨学科学术研究趋势接轨。

## 总结

大国学理念不仅是指研究范围的扩大，也是指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认同，在中国学术界实践大国学理念，不仅能够使得相关研究单位和机构人员能够从更大范围搜寻自己的研究兴趣，而且也便于他们采用跨学科方法来帮助自己研究。此外，实践大国学理念更有助于保存少数民族传统和文化，也有助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加深对对方传统和文化的理解，打破汉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增进中国认同的塑造。小国学理念在研究范围和方法都比较狭窄，且易强化汉族——少数民族的文化区隔，不利于中国认同的塑造。因此，在这一次的国学复兴运动中，中国学术界应该坚持大国学理念。